

语言、空间与边缘文学

江正云摇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前摇摇言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思考。文化的视角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原因在于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日趋模糊，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判断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位移，文学自身从未像今天这样以多种面貌、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由于原有的文学格局、文学秩序被打乱，现在要给文学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谈到文学，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已根本不可能被定于一尊。

但是，文学毕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逻辑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文学不可能生根发芽，也不可能生发出关于文学的种种话题。显然，本书作者认为文学的起点应该是语言，故本书将语言问题作为谈论文学的基石、作为开篇也就不无道理了。然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更是现实的现实，它与特定时代、特定空间的思潮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样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作者的视野，他试图通过关注当下文学语言面临的语境，探讨文学话语应该选择怎样的策略，对于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自有其积极意义。

考虑到语言的空间差异，文学作为空间差异的备忘录，作为反映、敞开空间差异的“镜”与“灯”，它如何被社会空间生产出来，又如何参与社会空间的营构；它对于文学史的建构、文学批评的开展有何意义，作者重点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文学空间及其消费形态的思考，不乏闪光之处。作者认为，特定的文学总是

通过自我边界的确立，对应着特定的文学空间。文学空间既是社会空间的产物，也参与着社会空间的生产，说它是社会空间的产物，是因为社会空间的种种存在物参与着文学空间的营构，语言的差异性、文学的差异性都是由社会空间的差异性所决定的；文学空间对社会空间的生产是借助其消费功能的实现而实现的，因此，文学空间是现实空间的文学转换，现实空间是文学空间的现实还原。所有这些，对文学研究视角的改变相信会带来新的启迪。

正因为立足空间这一视角，作者注意到了文学的边缘，对处于文学空间边缘地位的网络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文化意义进行了剖析，认为边缘文学的休闲功能具有建设性向度，边缘文学的某些艺术技巧、创作手段可以通过“化俗为雅”，为主流文学话语所借鉴和利用，不加分析地对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学盲目否定，对文学事业的发展于事无补，对边缘文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消除其功利至上主义等等，对上述论点作者都一一进行了阐释和论证，有些地方尽管稍显粗疏，但基本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作者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工作多年，勤奋学习、潜心思考、笔耕不辍，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进修、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拓宽了学术视野。近几年在《文学评论》、《文艺报》等国家级刊物、报纸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且有部分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全文复印或摘目索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问无止境，望作者以此为起点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张荣翼

圆园园年 苑月于武汉珞珈山

目摇摇录

孕刻城摇语境与预设 :文学作为语言表达	(员)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文学语言面临的语境	(圆)
差异空间的语言观 :作为预设的语言策略	(员)
文学语言别无它途 :在瓦肆与庙堂之间折返	(圆)
孕刻城摇文学空间 :文学存在的现实状态	(缘)
文学空间及其消费形态	(缘)
经典述史与空间述史	(远)
特定空间的特异叙事 :贾平凹短篇小说《古堡》分析 摇摇	(怨)
孕刻城摇边缘文学 :技术建构的文学空间	(员)
边缘文学的休闲特征及其建设性向度	(员)
网络文学 :赛博空间的众神之舞	(员)
通俗文学 :借力传媒的文学空间	(员)
孕刻城摇都市空间的意识形态 :王朔与池莉的城市叙事 ...	(员)
“一点正经没有”——王朔小说解读	(员)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池莉小说解读	(员)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圆)
后记	(圆)

李劫人 语境与预设：文学作为语言表达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文学话语面临的语境

差异空间的语言观：作为预设的话语策略

文学语言别无它途：在瓦肆与庙堂之间折返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文学语言面临的语境

—

全球化是二战后西方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传入我国。西方学者卡尔·亚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认为：“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天荒地使来自各个地方的贡献都获得了十足的重要性，亦即使全球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十足的重要性……它宣告了一场彻底的历史变革的开始。决定性的事情是不再存在什么‘外部的’。世界闭合起来了。它是地球上所有的人类的统一。新的威胁和机遇出现了。所有实质性的问题都变成了世界性的问题，境况是人类的境况。”亚斯贝尔斯的描述很清晰地给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的特性，诸如“世界闭合”、“人类的统一”、“世界性”等。

剑桥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为现代性所内在固有的向全球范围的更大的相互联结关系的一种延伸，“因此，可以把全球化定义为种种全球性社会关系的增强，它使各种本来天各一方的地方性联结在一起，以至此地发生的事情要受到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的制约，反之亦然。”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兰·罗伯逊则认为，全球化首先是一种文化过程，在此一过程中，世界统一性受到全球意识的驱动，并且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若干世纪。比较二人的观点，安东尼·吉登斯强调的是技术对所谓“天各一方的地方性”的联结，而罗兰·罗伯逊突出的则是人类“持续了若干世纪”的抱负和宏伟志向。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

全球化是一种社会性变革，是一个历时长久的预备性过程造成的结果。

对全球化概念作出比较全面界定的学者，我认为是英国罗汉姆普顿学院伦敦全球化研究组的专家马丁·阿尔布劳。他认为全球化就是：“员爰在种种个别情况下，通过种种实践、价值观、技术和人类其他产物在全球范围中的主动传播，当种种全球性的实践等等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日益加强的影响的时候，当全球作为一个聚焦点或一个对人类活动起塑造作用为人类提供服务的时候，在由任何此类情况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渐进性的变化中造成或被造成全球性的事物；被视为此类情况的概括表述；处于被抽象理解之中的此类情况。爰爰在第 员条中的任何一种意义或其所有意义上造成或被造成全球性的事物的一种过程。猿爰有种种特定的形式与第 员条中的情况汇成的总和造成的历史性的变革。”在马丁·阿尔布劳的界定中，他强调了全球化的分析性、现实性和历史性。

其实，考察全球化概念的内涵，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是知识技术层面。过去的知识积累和各种技术手段的运用，特别是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的极大提高，形成的全球范围接受处理信息的共时化和人类活动的同步化，是全球化的首要支撑点。

第二是社会关系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形成，资本积累及其向全球的扩张形成的世界金融秩序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是全球化的又一支撑点。这一支撑点直接影响了各个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人际关系和各民族的价值取向。

第三是政治文化层面。西方国家的资本及商品和其附着的价值文化观念，由西方中心向其同志文明(主要是基督教文明)和边缘国家的蔓延，是全球化的第三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的核心是商品化观念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普通人日常生活观念的影响，它通

过商品和传播媒介而得以实现。

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这就是地理区域层面即空间层面。如果说全球化的前三个支撑点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纬度和时间向度，地理区域层面体现的是全球化的空间向度。当从地理区域的层面考虑全球化的内涵，全球化就不只是某种单一的价值观念对全世界各个区域的简单覆盖，它还应包含各个不同的地域空间对流行价值观念的吸收和建构。

如果从以上四个层面理解全球化，全球化就不是人类从以往分属各民族、国家隔离的原始状态，被动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而是各民族、国家主动参与全球性社会价值观念重构，共同谋求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策略。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契机，它既可以参与某种普遍价值的建构，也可以引入对本民族发展有利的价值准则，从而推动本民族的向前发展；而对发达国家则是一个考验，就是他们能不能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如果只是站在本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则势必影响本民族的发展。

二

把全球化管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互动，是基于全球化的当代特点。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全球化的进程加速。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信息技术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普通百姓的日常起居到政府的重大决策，从一般办公室工作到大型经济投资和商务活动，已经越来越依赖四通八达的信息，信息处理的共时化，使得过去辽阔的地球被村落化。过去麦哲伦环绕地球一周需要三年，现在借助太空飞船只需很短的时间；~~1492~~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半年后，英王室才得知消息；~~1860~~1860年，林肯被暗杀，英王室~~1860~~1860周才

获悉；所有这些倘若在今天，只需数分钟便可传遍地球。因此，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在信息上的互动也随着之加快，这势必影响不同国家的经济决策。

二、全球化的内容多元。随着证券市场对全球资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的加强，金融业的全球化正在导致财富在全球的重新分配，国际货币体系也走向多极化。经济对社会生活的主导作用，也会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人们的衣食住行，各国的重大事变、重大决策都会打上全球化的痕迹。如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恐怖”浪潮，并形成了国际反恐怖主义思潮。

三、全球化的方式内转。20世纪以前，萌芽状态的全球化表现为世界贸易、世界市场在地域上的拓展，交通网络在地域上的延伸。20世纪上半叶开始向内转，而更加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特别是当代国际组织名目繁多，国际规范形式多样，人们的交往有序进行，全世界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治领域，政治民主化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高涨，并成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思路。经济领域则表现为经济市场化，全球分工、全球协作、经济一体化。文化方面则表现为深层文化认同，理性精神、发言意识在后发国家中散发出巨大魅力。

全球化的当代特点，决定了全球化效应的双重化，使之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其正面价值就是全球化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难得机遇，后发国家可以积极创造条件，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跨国资本，增强本民族的生产力，振兴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它也为民众个人的创造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选择和提升的空间。但是，它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滋生了各个国家、民族竞相发展相互攀比的心理，这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生

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爆炸。之所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会出现上述种种问题，就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隐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国家与国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表现，以前也许只是属于个别地域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之后已经升级为全球性问题。

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地域、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凸现出来。由于市场争夺、就业岗位的争夺日益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压力空前增大。所有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全人类。

第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中国家经济和个人发展的不平衡，容易使人心态失衡，个性扭曲，人的本质异化，信仰阙如和道德失范，引发很多人权人道问题。过去被认为是西方三大人性问题的暴力、吸毒、卖淫，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而在全世界蔓延，并已逐渐成为附着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肌体上的三个毒瘤。

第四是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冲突。经济全球化必须有某种价值观作基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积极推行其价值观念，目前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强制认同，即利用其经济、科技的优势，近代是通过殖民化运动，在现代则是通过市场化运动，将所有的可用之物都列入自由贸易的清单，包括知识、信息和观念，利用先发优势制定包含了其价值观念的游戏规则，后发国家因此而被强制纳入西方体系，认同其价值观。二是引诱认同。即通过输出价值观念为资本和商品开路。如麦当劳、肯德基等就是例子。它附着的是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因子，体现的是西方国家高度文明的吸引力，然后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媒的强化，给人感觉消费麦当劳、肯德基就是消费一种文化，就是消费一种观念和时尚，正是在对与这种产品类似的

文化商品的消费中，西方的价值观念被明火执仗地传播和潜移默化地认同。就 20 世纪来看，强制认同的阻力主要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当强制认同行不通时，他们便采用了引诱认同，推行和平演变策略，以实现西方价值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经济全球化激发的价值观冲突，在近代表现为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对抗；在当代则表现为市场化与反市场化、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对抗。这就为反全球化运动的萌发留下了契机。

三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行，它也诱发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全球化，这场运动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1999 年 9 月 17 日，华盛顿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召开。示威者阻拦与会官员的车辆，使他们无法进入会场。华盛顿警方用棍棒和水龙头驱赶人群，并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这是 20 个月内针对这两个国际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游行。上一次发生在 1997 年 5 月。

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集团第一次首脑会议在哈瓦那举行。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也涉及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东道国古巴主席卡斯特罗在会上呼吁，“毁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说：“让这个可恶的机构和它所代表的哲学消失，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发达国家中的某种势力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批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团结”起来，以对抗该组织所极力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表面上看，他们的一致是十分明显的：在华盛顿游行的一些人攻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许多方案损害了穷国及穷人的利益，一些人还呼吁，减免穷国债务。一位抗议组织发言人说，这次游行旨在反对跨国公司“接管”世界：“我们的政治制度已越来越变

成一小撮跨国公司集团的工具。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所有声音都被听到的世界，可现在我们的制度却只照顾跨国公司的利润。”抗议者提出建立一个“工人的社会”。在哈瓦那开会的发展中国家的首脑们提出穷国不能平等地从全球化中获利，被排除在全球化的机会之外。抗议全球化及对其不满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构成了重要的新内容。而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针对跨国公司的大规模抗议运动以前有过，但像 1999 年如此大规模、如此频繁地发生却很少见，抗议者的足迹遍及西雅图、达沃斯、华盛顿。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发达国家政府的指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在全球化这个背景下开展合作共同对抗发达国家，也是新出现的现象。2005 年在哈瓦那召开的 77 国集团首脑会议就是一个例子。这说明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考察这场运动目前可分为以下几种思潮：

一是原始主义。认为人类只有回到原始状态才能获救，如同希腊人向往质朴的黄金时代，希伯莱人向往伊甸园，中世纪向往修道院，他们向往原始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以及人类精神的纯朴。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和不幸，它使人的个性受膨胀的贪欲所支配，主张回到近代以前相互隔离的状态，以便互不相扰和平共处。

二是社会改良主义。这是源自西方社会内部的反全球化运动，它反的是西方国家现行的全球化政策和策略，认为这些政策和策略不仅使发展中国家受害，而且也祸及本国。国家与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西方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成为榨取后发国家资源、利润的工具，主张西方国家调整政策甚至减轻穷国债务，以便和后发国家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三是民族主义。它是非西方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运动。他们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为核心价值观，坚决反对西方文化的普遍性

扩张和入侵，固守本民族的历史积存，立足本民族的各种资源，借助少量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民经济，对全球化运动基本取对抗态势。

四是原教旨主义。一种有明显价值取向的反现代、逆分化的集体主义。它是一场旨在根据某一套独特的绝对价值重新组织社会生活领域的运动。它反对按西方标准建构的全球性，以自己的普遍性扩张来对抗西方的普遍性扩张，走向极端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了对抗西方，推行自己的价值标准，不惜使用暴力和人体炸弹，其实质是两种价值观的对立所必然产生的冲突。

五是马克思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它是全球化扩张的批判向度，对西方的殖民政策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印度、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也是对全球化持分析批判态度。总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其未来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四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场运动的出现总是有一场相反的运动与之伴随，全球化运动也是如此，身处这样一个语境，我们的文学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因为全球化不断滋生着去边界化过程、去边界化策略和越来越广泛的全球性，这会使某一国家、某一地域的文学面临着身份选择的困境；另一方面反全球化浪潮也可能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学自我封闭，最终走上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这就需要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早就指出：“时运交移，质文

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意即随着时代的更替、世运的推移，时代风貌和反映此种时代风貌的文学也会相应的变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刘勰通过分析唐尧之世，帝尧德泽深厚，教化广披，“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春秋以后七雄角逐，《六经》埋没，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及至汉代初期，高祖推崇武力，看不起读书人，轻视文学等等现象，表明文学的地位总是与时代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即使在同一朝代其地位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作家受到重视文学就会繁荣，作家遭到排挤文学也会跟着冷清。古人早就意识到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对当下文学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也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在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夹击下，我国开始走上现代化征途，文学及其创作者不可能脱离身处其间的时代氛围，因而，当下的文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姿态。一种是文学“被迫地或主动地由以前怀着无用之用的审美理想转换为一种市场化和消费性存在方式。消费、浮躁、自我抚摸、刺激、回避是非、消遣道义、绕开责任、躲避崇高等等，几乎成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较为普遍的精神姿态”。^①如《废都》的过度自恋导致的颓废和阴暗，《兄弟》的浅薄导致的虚假和粗鄙等。另一种是随着市场化的全面铺开，时代的剧烈转型和激烈动荡，文学所采取的寻求机遇积极发展的姿态。因为全球化、反全球化语境，不仅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多样化形态，文学创作者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的重大问题，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和人生经验。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当下的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相反，它是千载难逢的，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在剧烈地旋转，历史与现实、欲望与良知、都市与乡村、欢乐与悲哀、崛起与低回、迷狂与彻悟、传统与现代（后现代）、活力与悖谬等等，都在

^① 张志忠：《夜谈“当前文学创作症候”之根源》，《文艺争鸣》，2005 年第 1 期。

以空前的速度撞击、交汇，正是赋得沧桑句便工的大好时机”。^①尽管这两种姿态目前各自有着自己的市场，显然，后一种姿态是我们的文学所应该选择的一种姿态，我们不主张极端民族主义，但我们的文学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失去了其鲜明的个性气质，不能体现本民族的精神、情感、心理状态和 cultural 传统，它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文学也就越是世界的文学，只有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学方能为全人类文学增添色彩。

所以，文学面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我们要看到它们既有可资利用的一面，又有应该摒弃的一面。那些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能为全人类共度共享的价值及其原则，我们的文学可以合理地吸收并加以反映，而对于那些不同的价值观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对话，以增进了解，不能盲目照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展我们的文学语言，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

^① 张志忠：《也谈“当前文学创作症候之根源”》，《文艺争鸣》，1984年第1期。

差异空间的语言观：作为预设的语言策略

—

对文学民族性的坚守，其实质是对本民族语言观的坚守，因为“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词句写成的”，罗兰·巴特就曾提出：“作品中发生的只是语言行为，”由于文学活动的“语言行为”性质，一个民族传统的语言观对该民族文学活动的影响就不可小觑，可以说正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和关于语言的认识，预设着该民族的文学行为和文学样态，所以，考察不同民族对语言的看法对理解其文学状况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我们看看西方对语言问题的认识。伊格尔顿指出，“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的文学理论，20世纪‘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构成经验。”所以，意义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是用语言构造出来。然而，语言在构造意义的时候，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常面对难以逾越的鸿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萨特就曾抱怨说：“任何东西经人一说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纯洁性。”罗兰·巴特也说：“任何一位专家卷入了单枪匹马反对语言权势的斗争，都不可避免被其